

朱東潤著

張居正大傳

吳敬恆題



張居正大傳

朱東潤著

開明
書店

張居正大傳

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月初版
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再版
每册定價國幣六元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洗人

著作者

朱東潤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序

二十餘年以前，請到鮑斯威爾底約翰遜博士傳，我開始對於傳敍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，但是對於文學底這個部門，作切實的研討，祇是民國二十八年以來的事。在那一年，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敍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，更談不到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，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荆棘的工作。

宗旨既經決定，開始研讀。除了中國作品以外，對於西方文學，在傳敍作品方面，我從勃路泰格底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底著作；在傳敍理論方面，我從提阿梵特斯底人格論讀到莫洛亞底傳敍綜論。當然，我底能力有限，所在地底書籍也有限，但是我祇有盡我底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。

在這幾年以內，陸續寫成「中國傳敍文學之進展」，「傳敍文學之前途」，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」，「傳敍文學與人格」，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，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。除了散篇以外，本擬敍述中國傳敍文學之趨勢，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，祇能寫定一些綱領，未能完成：完成的祇有「八代傳敍文學述論」，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。

對於中國傳敍文學底進展，總算勉強有些認識，但是認識過去，當然不是開導將來。佛家所謂「閱盡他寶，終非己分」，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。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，專靠稱揚古人，敍述古籍，其結果祇落得「閱盡他寶」，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。一般文學如此，傳敍文學也是如此。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

敘。這是一個嘗試，成功固然很好，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，實際也是一種成功。自己對於失敗，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，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！

寫作底目標決定，其次便是形式底問題。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，文學是整個的，在近代的中國，傳敘文學的意識，也許不免落後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，必然有把我們底意識激盪向前，不容落伍的一日。史漢列傳底時代過去了，漢魏別傳底時代過去了，六代唐宋墓銘底時代過去了，宋代以後年譜底時代過去了，乃至最進步的著作，如朱子張魏公行狀，黃榦朱子行狀底時代也過去了。橫在我們面前的，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敘文學底進展。我們對於古人底著作，要認識，要瞭解，要欣賞；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底前途。古人支配今人，縱使有人主張，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，不能想像的謬論。

西方三百年來傳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，在形式和內容方面，起了不少的變化，假如我們採取這一條路線，我們究竟採取那一個方式呢？

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底作品。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爲家傳戶誦的文章。這裏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，和他底許多朋友，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，討論政治，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。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諷，捧腹大笑，贖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底不幸。約翰遜笑也有，罵也有，但是他底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，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，躡手躡腳，更引起閨堂的狂歡。這是生活，因此這部著作成爲不朽的作品。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，至少要作者和傳主，在生活上有着密切的關係，而後纔有敘述底機會。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，都是這類著作底必要條

件。

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底維多利亞女王傳。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，打開「現代傳敘文學」底局面。在薄的二百幾十頁裏面，作者描寫女王底生平。我們看到她底父母和伯父，看到她底保姆，到她底丈夫和子女。我看到英國底幾位首相，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里。這裏有英國的政局，也有世界的大勢。但是一切祇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裏面。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，沒有繁瑣的考訂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，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底丰神。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，其實不是偶然的事。但是現代的中國，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。英國人有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，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，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，一部狄士萊里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，他們底基礎堅固，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歷，任何的推論都要有證據。在這個情形之下，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，探赜鉤玄，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，奪取不朽的地位。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。儘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，但是我底愚見，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，決定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。中國人模仿他底寫法，祇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，似小說不似小說，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。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，轉瞬的次數不在少處，但是始終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。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，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？仲弓說過：「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太簡乎？」朱子集注：「言自處以敬，則中有主而自治嚴，如是而行簡以臨民，則事不煩而民不擾，所以爲可；若先自處以簡，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，而所行又簡，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？」這是說的政治，但是同

體也適用於文學，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，不能談到簡易：本來已經簡易了，再提倡簡易，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？所以斯特拉哲儘管寫成一部名著，但是今日的中國，不是提倡這個作法的時代和地點。

那麼惟有談到第三個作法了。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，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，但是一切都有來歷，有證據。笨重確是有些笨重，然而這是磐石，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，便不能不承認磐石底笨重。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，不是牠底笨重，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擇和持論底不能中肯。在這兩點，從斯特拉哲底著作裏，我們可以得到啓示，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。莫洛亞攻擊這派底著作，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，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，祇是一種諛慕的文字，徒然博得遺族底歡心，而喪失文學的價值。這個議論，確然獲得我們底同情，傳敘成爲頌揚的文字，便喪失本身底價值，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。

現代中國所需要的傳敘文學，也許祇是一種有來歷，有證據，不忌繁瑣，不事頌揚的作品。至於取材有抉擇，持論能中肯，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。在作者著手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，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，一切祇能付之讀者底評判。孟子說過：「智譬則巧也，聖譬則力也，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爾力也，其中非爾力也。」力底方面，我們應當努力；巧的方面，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。

作法既經採取這一種，便得確定一個傳主。我曾經說過：「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，自的一生的記載，在優戶的傳敘文學家底手裏，都可以成爲優良的著作。所以在下州小邑，窮鄉僻壤中，田夫野老。癡兒怨女底生活，都是傳敘文學底題目。」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，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。一個平常的人物，不能引起讀者底注意，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，惟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，從人格分析

方面着手，使讀者對於傳主底性格，感到深切的同情，然後始能瞭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，都有獨特的價值。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，祇有最有的幾個人，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，在這方面，實際便無從着手。在西方文學裏面，平常人物底傳敘，還是非常地寥落，這是一個理由。

因此，祇能從偉大人物着手。三十年的秋天，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時候。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，但是在着手的時候，許多困難來了。有的人偉大了，但是他底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瞭解。有的人底偉大是我所瞭解的，但是資料方面，不是少到無從採取，便是多到無從收拾。抗戰期間的圖書館，內部底損失和空虛，是盡人皆知的事實；抗戰期間的書生，生活底艱苦和困乏，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。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，更有許多顧慮。其次，在下筆的時候，還得考慮人類共同的弱點。傳主底時代太遠了，我們對於他底生活，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；太近了，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底陰影下面，對於他底一生，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。那一個秋天，我因為傳主底選擇，增加不少的痛苦。

最後纔決定了張居正。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，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，實在數不上幾個。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，這整整的十年，居正佔有政局底全面，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。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，整個的政局是混亂，以後數十年，還是混亂；祇有在這十年之中，看到清明的時代，敵人由分化走到崩潰，中國由安定走到發展，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。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，其故在此。但是居正底一生，始終沒有得到世人底瞭解。「譽之者或過其實，毀之者或生其真」，是一句切實的批評。最善意的評論，比居正為伊周，最惡意的評論，比居正為溫莽。有的推為聖人，有的甚至斥為

禽獸。其實居正既非伊周，亦非溫莽；他固然不是禽獸，但是他也並不志在聖人。他祇是張居正，一個受時代陶鎔而同時又想陶鎔時代底人物。

但是，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。

第一，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。現代傳敘文學，常常注意傳主底私生活。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寫，可以使文字生動，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，因此更能瞭解傳主底人格。但是關於居正底私生活，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；明代著作裏面，也許有一些記載，我們爲慎重起見，不敢輕易採用，這一個缺憾，幾于無法彌補。

第二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，祇有政治；因爲他佔有政局底全面，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，不能不加以敘述。繁重，瑣屑，都是必然的結果，但是不如此便不能瞭解居正。也許有人以爲史傳中的人物，寥寥數百字，可以挈舉當時政局底大概，爲什麼要這樣地浪費筆墨？不過，任何一篇史傳，祇是全部正史底一篇，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，儘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，這是傳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權利。

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。大家知道居正綜覈名實，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地綜覈，他們便有些茫然。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底制度；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底運用，不是一件罕見的事。尤其不幸的是我國人那番好古的精神。因爲好古，所以不知今代，乃至不知和今代接近的時代。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，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、余子俊、翁萬達、楊博等所築的邊牆；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，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、萬恭、李化龍、曹時聘等所

擊的水道。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知今的習氣，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，發生一種隔閡。說少了，他們不會明白；說多了，他們會嫌煩瑣：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。

這許多困難底後面，還有一個難題，便是材料底缺乏。明史，明史紀事本末，明紀，明史稿，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，固然可以到手；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，現在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，除了問見徵引以外，竟無從利用，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。

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。以本人底著作，爲本人底史料，正是西方傳敘文學底通例。一個人底作品，除了有意作僞一望即知者以外，對於自己的記載，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底作品以上。關於這一點，當然還有一些限制：年齡高大，對於早年的回憶，印象不免模糊；事業完成，對於最初的动力，解釋不免遷就。對於事的認識，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；對於人的評判，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。人類祇是平凡的，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，但是祇要我們細心推考，常常能從作者底一切踈駁矛盾之中，發現事態底真相。西方傳敘文學以傳主底作品爲主要的材料，其故在此。

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，是明刻太岳集，卷數同。在這四十六卷之中，共奏疏十三卷，書牘十五卷，文集十一卷，詩六卷，女誠直解一卷。除女誠直解以外，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，當然是最好的史料。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。居正進白蓮白燕頌，見明史，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。居正爲高拱墓銘，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，今不見文集。居正有請今天下度甲疏，略見明史紀事本末，今不見奏疏。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：「先公文集，在舊記室所者，自嗣修等逢難，十餘年後，

始得完歸，存者十八，逸者十二；如少年所作諸賦，全逸；應制詩，敕撰文，逸十之二；僅據存者編次之，凡爲詩六卷，爲文十四卷，合女誠直解計之故言此爲書牘十五卷，爲奏對十一卷，合之則爲全集，離之亦可四

種。」所謂「存者十八，逸者十二」，大致是一句通詞。余懋學曾爲居正進白蓮頌，提出彈劾；

明史卷二三
五余懋學傳

神宗曾斥居正「假以丈量濫飾，騷動海內」；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蓮頌和請今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，大致是有意

的刪除，不是無意的逸失。至於高拱墓銘底被刪，當然祇是嗣修懋修底偏見。韓愈論張巡許遠底後裔，斥

爲「兩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」。大致嗣修懋修恰是「不能通知二父志」的一類。

這四種著作底編次，也不一律。假如全體都用編年底次序，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，偏偏嗣修等要分類，尤其是詩集文集，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功夫，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，而推定底結果，祇是一種假定，不是確定，所以史料底價值，不免受到影響。

幸虧奏疏書牘底篇次，大體是編年的，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，但是編年之中，還不免有些分類底意味。奏疏十三卷之中，前十一卷爲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，而後二卷爲入閣以前的作品。書牘十五卷，前十三卷爲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；第十四卷爲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，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；第十五卷爲報知己書，與王卅貞卅懋兄弟書，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，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。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。

最詭異的是書牘諸篇底標題。嗣修自言：「先公書牘，自舊記室所攜來，蓋嗣修等遭家難十餘年所，而手澤完歸，考其年月，似裁答俱無恙也。或有舉其官，缺其號，或有舉其號，缺其官，或官號俱備，或

直舉其諱，凡例不定，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，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。」書牘凡例敬題 嗣修認為書牘標題，出於居正口授。其實這是一句遜辭。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書，其時鄭必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；有答薊遼總督張崐峽書，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；及居正歿後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。諸如此類，可舉者尚多。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，但是標題方面，還是非常凌亂；有一部分出於居正口授，還有一部分則出於事後的追題，至其或出於書記之手，或出於嗣修懋修之手，則不可考。

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，所謂「編年」，其實祇給一個先後的順序，並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於某年某月，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，編年底作用，實際還不能充分，一切從史實方面推求，證驗，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。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，已經便利了許多。

要為居正作傳，眼前所有的材料，祇有這一點點。倘使看到明實錄，對於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，一定可以得到多的認識；倘使看到同時諸人底文集，對於居正一生的史實，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。但是沒有辦法，一切的空論，掩飾不了材料底空虛。我感覺徬徨了，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，但是還有一些眷戀，終於竟把這本傳敘寫成。這是為的什麼？我認定傳敘文學底寫成，不完全是材料底問題，同時還有寫法底問題。蒙尼辨耐底狄士萊里傳寫成六大厚冊，一百五十萬言，在材料方面，可稱毫髮無憾，但是莫洛亞底狄士萊里傳繼此出版，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。華盛頓早年底日記，直到最近方始發現，關於他早年的戀人，還無從確定名姓，但是華盛頓底傳敘，已經出到五百種以上，並沒有因為材料底不完備而停止。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。大家知道有一個「至善」，也知道這個「至善」是

無法完成的，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於「至善」的努力。也許我們對於居正的估計，未免朦朧一點，其實從他對國家的關係講，人物不能不算偉大，祇要傳敍文學底風氣一開，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，並不是不能想像的事。那麼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，替大眾做一個前驅，未嘗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。

其次關於文字的方面。我寫「讀詩四論」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，用的文言，因為這許多書中，充滿文言的引證，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，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。但是在寫的時候，常時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，必需運用新的筆調，纔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憾。後來寫「八代傳敍文學述論」，用的語體，便是這個理由。用語體寫的時候，也有兩種困難。第一，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，讀者最易感覺文字底不諧和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。其次，語體底語彙太貧乏了，因此在敘述的時候，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彙或另行創造的必要。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，不過最近數年以來，這樣的寫法，已經成為風氣，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，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，也就覺得無可非議。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」。也許二十年以後，又有一種變化，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罷。

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。對話是傳敍文學底精神，有了對話，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，一一如在目前。一篇項羽本紀，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秦始皇帝游會稽，渡浙江，項羽和項梁往觀，項羽說，「彼可取而代之也。」項梁掩其口曰，「無妄言，族矣！」這是兩個人底對話。項羽要殺宋義，他說：「將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！今歲饑民貧，士卒食芋菽，軍無見糧，乃飲酒高會，不引兵渡河，因趙食，與趙並力攻

秦，乃曰「承其敝！」夫以秦之彊，攻新造之趙，其勢必與趙，趙舉而秦彊，何敝之承！且國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，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，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，非社稷之臣！」這是項羽誓衆的宣言。其後鴻門之宴，項羽、范增、項莊、沛公、張良、樊噲，都有說話，文字非常生動，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，項羽按劍說：「客何爲者？」這是問樊噲的，偏偏樊噲不答，張良說道，「沛公之驢乘樊噲者也。」項王纔說「壯士，賜之卮酒，」這又是吩咐侍從了。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，使人感覺異常地活躍。

這個寫法，在小說家手裏，成爲最好的工具。現代傳敘文學家也常時採用這個寫法。但是傳敘文學是文學，同時也是史。因爲傳敘文學是史，所以在紀載方面，應當追求真相，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，絕不相同。這一點沒有看清，便會把傳敘文學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；文字也許生動一些，但是出的代價太大，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。

在寫這本書的時候，祇要是有根據的對話，我是充分利的，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像的話。這裏另外也有一些困難。從前人記對話，往往不用活的言語，而用死的文字。例如谷應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後，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昇等計議的一節：

階固已豫知，姑問稿安在，吏出懷中以進，閱畢曰，「法家斷案良佳。」延入內庭，屏左右語曰，「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，生乎？」曰，「死不足贖。」「然則，此案將殺之乎，生之乎？」曰，「用楊沈正欲抵死。」階徐曰，「別自有說。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，然楊以計中上所諱，取特旨；沈暗入

招中，取泛旨。上英明，豈肯自引爲過？一入覽，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，必震怒，在事者皆不免，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。」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

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昇等是這樣說法的。明白一點說，從前人把白話繙成文言，現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繙回白話。這一類繙譯的方法，在經史方面有相當的根據。堯典：「帝曰：『疇咨若時登庸？』」放齊曰，「胤子朱，啟明。」帝曰，「吁，嚚訟，可乎？」帝曰，「疇咨若予采？」驩兜曰，「都，共工方鳩僝工。」帝曰，「吁，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。」這是一段詰屈整牙的文章。太史公五帝本紀便完全改過了，我們看到「堯曰，『誰可順此事？』」放齊曰，「嗣子丹朱開明。」堯曰，「吁，頑凶，不用。」堯又曰，「誰可者？」驩兜曰，「共工，旁聚布功，可用。」堯曰，「共工善言，其用僻，似恭漫天，不可。」太史公做過一番繙譯工夫，文字便非常地通暢。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，那麼，到我們把谷應泰底文言，繙回白話，一定不會感覺詫異。

在把文言繙回白話的時候，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繙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，而不是繙成現代人常用的語言。我們對於明代人底說話，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，但是不妨認爲明代人不會用現代特有的語彙，不會用現代變質的文法，不會用現代稗販的幽默。在這幾方面加以注意，也許可以得到明代人說話底大概。稍爲困難的是明代帝后底說話。這一個階級早已隨着時代而消失了，我們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觸。他們是和普通人一樣地說話嗎？還是同劇本所寫的一樣，平時也是稱「孤」道「寡」嗎？從我所見到的，大致他們還是和普通人一樣。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說過：「說與皇帝知道，爾婚禮將成，我當還本宮，凡爾動靜食息，俱不

得如前時聞見訓教，爲此憂思。」張文忠公全集奏疏神宗自己也說過：「我一時昏迷，以致有錯，爾等就該

力諫乃可。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，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，我今改過，姦邪已去。」秦疏九請處治邪倭內臣疏這都

是極普通的說話，我們可以從此看到帝后說話底大概，在敘述對話的時候，也有一個根據。

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間留下許多對話的記載，如謝召見疏^一、秦疏召辭紀事^二、秦疏召見紀事^三、秦疏召見

平臺紀事^四、秦疏送起居館講大寶箴紀事，送起居館論邊情紀事^五、秦疏十一在記載底當中，居正偶然也有把對話寫

成文言的時候，但是大多數都能保存當日的語氣，即如謝召見疏記隆慶六年六月間居正奉召入朝以後，

神宗說：「先生爲父皇陵寢，辛苦受熱，」又說，「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。」其後居正奏請遵守祖宗舊

制，講學親賢，愛民節用，神宗答稱「先生說的是。」居正再請神宗慎起居，節飲食，神宗說，「知道

了。與先生酒飯喫。」在這許多地方，我們看到當日的語調，正是最有價值的記載。

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記的說話，有時寫成文言，其實文言和語體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，而在

說話之中，爲求語言的簡練，常時有由語體轉成文言的傾向。授課的時候，教師有時採取近乎文言的語

句，以便學生筆記，正是平常習見的事，何況奏對之時，更覺天顏咫尺，不許冗長煩瑣呢？

這本書的大體計畫，是在三十年決定。三十一年春間，寫成「八代傳敍文學述論」。三十二年春間，

重行寫定「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」，是爲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四種第五種。在這幾年之中，一切賸餘的時

間，都消耗在這本書上，實際著筆是從三十二年一月二日開始，八月六日終了，是爲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六

種。

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，感覺一點詫異。傳敍文學裏用這兩個字，委實是一個創舉。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；尙書有尙書大傳，禮記也有大傳；但是在史傳裏從來沒有這樣用過。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的史學，發源於經學，一百二十篇的史記，祇是模仿春秋的作品；十二本紀模仿十二公，七十列傳模仿公羊穀梁，「傳」底原義，有注底意思，所以釋名釋典藝云，「傳傳也，以傳示後人也。」七十列傳祇是七十篇注解，把本紀或其他諸篇的人物，加以應有的注釋。既然列傳之傳是一個援經入史的名稱，那麼在傳敍文學裏再來一個援經入史的大傳，似乎也不算破例。

幾年以來的心力，所成就的祇是這本很平常的著作，自己底學力，僅僅達到這個階段，原是無可如何的事。我底希望，本來祇是供給一般人一個參考，知道西方的傳敍文學是怎樣寫法，怎樣可以介紹到中國。我祇打開園門，使大衆認識裏面是怎樣的園地，以後游覽的人多了，栽培花木的也有，修拾園亭的也有，祇要園地逐日繁榮，即是打開園門的人被忘了，他也應當慶幸這一番工作不是沒有意義。法顯行傳記法顯經過沙河底一節：「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，遇則皆死，無一全者。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。遍望極目，欲求度處，則莫知所擬，惟以死人枯骨爲標識耳。」在一個茫無邊際的境界，我們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跡，作爲自己前進的路線。前人對於我們所盡的責任，正是我們對於後人所有的義務。無論成功或失敗，現在底努力，對於後人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。

我應當趁這個機會，對於遠方的兩個人，表示衷心的感謝。

二十餘年的生活，養成我不事家人生產的習慣。我獨自漂流異地，難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。對日作